

热点观察

对低俗网络用语说“不”

□ 汤文靖

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语言文字文明教育,强化对互联网等各类新媒体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和管理,坚决遏制庸俗暴利网络语言传播,建设健康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近年来,“屌丝”“撕逼”“绿茶婊”等低俗用语充斥网络空间,并且蔓延到人们的日常交流用语甚至严肃文本的写作中,正规的汉语受到污染和破坏。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庸俗暴利网络语言的横行,会导致社会文化生态的粗鄙化。因此,净化网络空间、捍卫语言的纯洁性刻不容缓。

“语言任性”破坏了汉语的纯洁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网络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必备工具。相较于现实生活,网络空间的语言表达具有自由化的特征,这为网民的“创造性表达”甚至“口无遮拦”提供了便利,各种新的表达方式和网络用语大量产生,并借助网络实现病毒式传播。

网络语言最初是从电脑键盘上“敲”出来的。为了提高沟通效率,网民“敲”字时,能简则简,能省则省,不会对语言进行精心雕琢,导致网络语言简单化、碎片化、随意性。直接对传统汉语的规范性和严谨性造成冲击。比如,大量数字、符号、字母混合使用,“3Q”表示谢谢你,

“9494”表示就是就是,“emo”表示难过,“YYDS”意思是永远的神,“T_T”表示流泪,“orz”表示跪着的小人。还有一些网络语言用同音词代替原词,如“蚌埠住了”表示“绷不住了”,“邮箱”写成“幽香”,“大侠”写成“大虾”。更有一些生造的新词,“蓄紫”表示“这样子”,“摸鱼”表示“不专心,偷偷做别的事”,“干饭人”表示“吃货”,“绝绝子”表示“太绝了”等等。

如果说上述网络词语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沟通效率,让网络表达“有趣起来”,那下面这些则是赤裸裸的低俗、庸俗、恶俗。“槽逼”“尼玛”“屌丝”“绿茶婊”“逗比”“然后并卵”……这些动辄涉及性器官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羞于启齿,如今却在网络上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甚至反向输入到现实生活中,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用语。

汉语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

的语言,它是表意语言,而其他语言基本都是表音语言。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不同于表音文字的独特语法规则。符号、字母、数字和汉字杂糅的网络用语,破坏了汉语的生态系统,表情符号的书面化使用,损坏了表意文字的完整性,使得人与母语产生隔阂。至于那些庸俗暴利的网络用语,不仅污染了网络文化环境,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也会拉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网络语言狂欢会拉低大众审美

曾经有媒体报道过一位小学生的检讨书,其中部分文字是这样的:“但是她当时的口气真是7456。所以她才说她是恐龙”,“不喜欢对老师PMP”,“希望老师不要还是286”。拿到检讨书

的老师一头雾水,多方请教后才知,“偶”就是“我”,“7456”是“气死我了”,“PMP”是“拍马屁”,“恐龙”是形容“长相一般的女生”,“286”代表老式电脑的速度,现在用它形容“落伍”。无独有偶。笔者在批改大学生的作业时,常见到这样的词句:“我小心翼翼地说”“我订了七点钟的闹钟”,学生们坚定地认为,“小心翼翼”“订”就是正确的用法,因为“网络上都这么用”。由此可见网络语言对青少年影响的深远。

语言能够塑造思维。当下的大中小学生都是网络原住民,他们的很多知识包括语言来自互联网的“投喂”。当低龄的孩子还没有掌握规范的母语,就整天沉浸在“时尚”的网络语言中,心中所想不能使用正规的汉语表达,而是诉诸网络热词和表情包来代替,久而久之,他们就会离传统汉语中的诗词文赋、成语典故越来越远,进而跟自己的母语产生文化隔阂,最终会成为在碎片化的网络用语、光怪陆离的网络符号、生搬硬造的网络新闻中间来回穿梭的“流浪汉”。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说,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童的游戏罢了。各种恶搞式拼接的网络语言带来了平民话语的修辞狂欢,这种狂欢其实是对传统语言形态和文化姿态的解构甚至颠覆,在推动文化生态多元化的同时,也会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思维方式。

当前,网络语言的发展路径已经很清晰:从虚拟空间进入口语表达,再进入书面语,最终有可能沉淀到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如果任由庸俗暴利网络语言发展,久而久之就会成为约定俗成的惯用语,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社会语言审美和大众文化审美的重新塑造。

庸俗暴利网络语言对大众文化审美的作用必然是负面的,如果放任不管,这种负面影响会从网上蔓延到网下,最终将拉低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

捍卫语言纯洁应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古人云,言为心声,语为人镜。个人的修养离不开语言的

文明,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朗也离不开网络语言的规范。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用文明的语言与他人沟通,应该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条底线。

放眼全世界,捍卫母语的纯洁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曾有报道说,你跟法国人说英语,他明明能用英语交流,却会对你摇头,他害怕英语会凌驾于法语之上,进而影响法语的纯洁。就我国而言,抵制网络语言低俗化倾向、捍卫汉语的纯洁,应该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文化自觉。

宏观层面,国家应加强针对网络语言的立法工作,进一步修订、细化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让规范使用语言和治理网络语言低俗化有法可依。

承担大众传播任务的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媒体以及各种新媒体平台应扮演好“把关人”角色,切不可为庸俗暴利网络语言的蔓延大开方便之门。学校更是捍卫语言纯洁性的重要力量。面对无孔不入的网络用语,各级各类学校应从教材、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和考试标准等方面正本清源,提高青少年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开展健康文明的青年生活的意识和能力,在青少年心中筑起一道阻挡低俗网络语言的“防火墙”。

作为网民的我们,应树立网络共同体意识,形成保卫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化自觉,使用网络语言时,主动设立自娱自乐的禁忌规范,自觉抵制庸俗低俗的网络语言。

语言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捍卫语言的纯洁性、抵制庸俗暴利网络语言,并非一刀切地反对使用网络用语和外来词语。在汉语发展史上,“干部”来自日语,“拷贝”“沙发”来自英语的音译,而来自于网络的“给力”“正能量”“山寨”等新词更是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语库,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同。网络语言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我们期待更多传递正能量的网络用语涌现,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让低俗网络用语早日淡出,让文明之花加速生长。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走近文艺家



贺敬之

资料图片

97岁的他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和生活热情的浪漫主义诗人,20岁时与丁毅合作执笔写出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白毛女》,并通过《南泥湾》《回延安》《雷锋之歌》等经典作品,实现了“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他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时代的强音,而不去咏唱那些与时代大潮无关的小悲伤、小欢喜。

贺敬之:为人民写诗 为时代放歌

□ 吴志菲 余果

近日,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在京召开。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对此,曾出席首次文代会的贺敬之老人深有感触。他深情地说:“我是吃延安的小米,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是延安人民培养了我。”言语中流露出对第二故乡人民的感念。至今,贺敬之家里的书架上仍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上面印的是延安宝塔山。

1940年4月,不满16岁的贺敬之与三位同学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不知道当时的想法怎么那么强烈,走到延安去,一定要到延安去!”

奔赴延安途中,贺敬之写下了组诗《跃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雾/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着向前方……”

到延安后,贺敬之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顿饱饭,感觉一切都是新的,“尽管生活比较艰苦,学习也比较紧张,可总觉得充实,有使不完的劲”。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到鲁艺做了一个演讲。“毛主席站在篮球场中央,身穿带补丁的旧军装,脚穿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着一张小桌,开始对鲁艺师生讲话。”谈到这个话题,贺敬之的思维仿佛又飘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我搬个小马扎坐在人群第一排,离毛主席很近”。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贺敬之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系统的认识,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让他感触最深。接着,他下农村,进部队,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的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大生产运动期间,贺敬之被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热情深深感动,仅用一天时间便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南泥湾》的歌词,深深地鼓舞了抗战中的全国军民。

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传到了延安。鲁艺打算将其创作成剧目,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让当时才20岁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我大年轻了,当时不太敢接受这活儿,担心写不好。”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或许白毛女故事的有些情节与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他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喜儿的悲惨命运变成密密匝匝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贺敬之每写完一幕,作曲就开始谱曲,接着导演和演员试排舞蹈。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的贺

敬之累倒了,住进医院。丁毅接过笔杆,写完了最后一幕“斗争会”。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正值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都来了。贺敬之对首演时的盛况记忆犹新:“演出时,我负责拉大幕,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中央领导人和观众一起起立鼓掌,现场哭声一片”。

《白毛女》把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融合,在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被誉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当年,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白毛女》中的《北风吹》《扎红头绳》等经典唱段的旋律。后来,歌剧《白毛女》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如今再次谈及《白毛女》,贺敬之总是反复强调那是“集体创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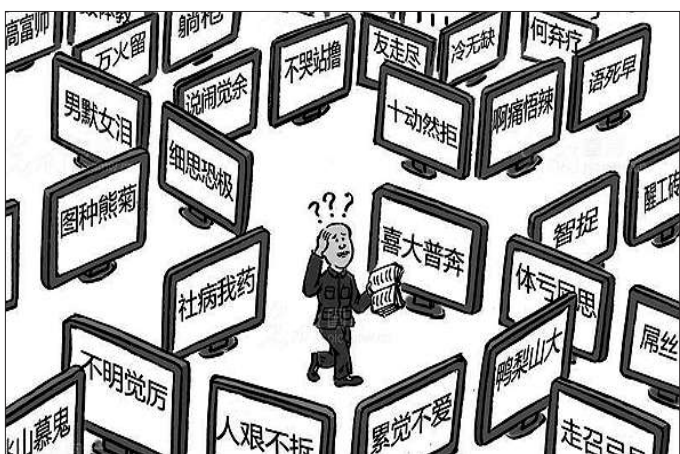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多次回到第二故乡延安。1956年3月,贺敬之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为了抒发当时的心情,他用信天游的方式写下了长诗《回延安》,一边流泪一边吟唱,一夜无眠。后来,《回延安》传遍大江南北。1982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看到延安拨乱反正后的新气象,心里甚是激动,创作出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痴水,一饮更清凉。”

除了上述诗歌,他还创作出《又回南泥湾》《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反映了人民心声,又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

从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贺敬之仍以短小的旧体诗抒发自已抚今追昔之思、忧国忧民之情,并整理出版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诗书集》《贺敬之文集》。他的诗歌从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时代生活的重大问题,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时代的强音,而不去咏唱那些与时代大潮无关的小悲伤、小欢喜。

1949年7月,25岁的贺敬之参加首次文代会。那次会议,把旧社会很多人瞧不起的艺人看作人民艺术家。从此,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文艺工作者的地位越来越高,待遇越来越好。不过,近些年其中一些人忘记了初心使命,离人民越来越远。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向文艺工作者发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号召。97岁的贺敬之老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将这股股嘱托听得进去,记在心头,在创作中真正“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

(吴志菲、余果均为报告文学作家)



近年来流行的部分网络用语

资料图片



规范语言使用应从娃娃抓起,图为语文老师正在教小学生书写字词。

新华社发

讲好中国故事,须让文物“开口说话”

□ 洪宇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会议提出,要开展创新服务,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在历史和数字化时代,文化新业态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其中文物成为重要的标志要素,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网络游戏与文物结缘较早。《王者荣耀》中的长城和敦煌,《QQ飞车》中的司马台长城赛道,《天涯明月刀》中的云冈石窟……越来越多的网络游戏为玩家架起了了解文物和历史的桥梁。很多自带中国文物元素的游戏已成功“出海”。

2020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154.5亿美元,不仅在美、日、英、德等主流市场站稳脚跟,在沙特、土耳其、印尼、巴西等新兴市场也表现良好。在游戏的超级数字场

景中,一件件文物不再是身蒙尘埃的老物件,而成为外国玩家眼中中国文化最好的讲述者。

文艺工作者也从文物中寻找灵感,或直接把文物作为创作素材。网剧《古董局中局》围绕古董鉴定展开,剧中文物以及主人公许愿的文物鉴定素养,成为展开“局中局”至关重要的线索,而线索背后的鉴定故事与文物行业的种种规矩,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目则运用综艺手段直接讲述文物背后的中国故事。许多文博单位及相关机构、文物爱好者、文博“发烧友”更是直接试水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制作推出了内容丰富、异彩纷呈的文物类短视频节目。根据抖音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5月,抖音上跟博物馆有关的短视频数量超过3389万个,播放超过723亿次,获赞超过21亿。

用文物讲述中国故事不难,

难的是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在近日由故宫博物院和腾讯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文化+科技”国际论坛上,各界专家的一个共识是,要破解上述难题,须运用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数字化水平,推动文物利用方式的创新。论坛期间,推出了故宫超高精度“数字文物”,并借助VR、AR技术还原了故宫倦勤斋的部分场景,让观众见识了数字化赋能文物的强大能力。专家们认为,数字化技术手段是让文物“开口说话”的一条捷径,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人们的生活、耳闻和心间。

讲好中国故事,文物不仅要“开口讲中国话”,还要学会“讲好中国话”,即做好文物的海外传播工作。总体来看,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以来,特别是“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推出以来,我国文物“出海”的

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带有中国文物元素的文化新业态在海外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线下模式的有益补充,助力了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的提升。不过,不同文化业态尚未形成讲述中国故事的合力,且在提炼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此次《实施意见》的出台表明,中央对文物事业寄予了更高期望。广大文物工作者的肩上又多了一项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使命。接下来,文博行业须推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进一步夯实文物乃至文化数字化的基础,为文化新业态提供更加丰富的创作资源,加快将承载中华文明的文物转化为各种数字化产品,为海外观众与我国文化瑰宝近距离接触提供便利,进而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铺就文明互鉴之路。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